

郁风◎著

画中游

下

大众文艺出版社

青年读本

黄音迪题



青年读本

C52
147/3

画 中 游

郁 风 著

下

大众文艺出版社

莫干山二十四小时

莫干山在杭州西北六十公里，著名的避暑胜地。它是天目山的支脉，拥有众多的山峰，方圆百里。相传春秋末年，莫邪干将在此铸剑，莫邪投入炉中而铸成雌雄二剑，莫干山于是由此得名。

画展于11月初在杭州闭幕后，偷得一日闲，承莫干山管理局接待，上山去住了一晚。车行至德清县境内，转入小路，从茂密的树林中盘旋而上，十数回合，直到约六百米高处的剑庐宾馆下榻。在宽阔的阳台上，远望苍翠的层峦叠嶂，都浸在暮霭中。静静地送走了夕阳，连日来的疲劳一扫而光。

次晨醒来看表是六点，忙打开窗幔，就见紫雾迷漫的群山尽头，正在升起一线红日，我痴痴地紧盯着它，显然在慢慢移上来，由一线变成向下的月牙，再成为半轮……终于整个红日出现在天边，然后整个山谷浴在晨光里。

我们冒着深秋的凉气，踏着雾水走向竹林小路，翠绿的竹杆任你穿行，整座山被竹林密密实地覆盖着。走过三四座古老的用大块岩石砌成的别墅建筑，都无人居住。



据说夏天却是客满，连大客厅里都睡满了人。

绕回到住处已是八点半，吃了丰盛的早餐，各式点心之外，送白米粥。多种小菜中我最喜欢而久吃不厌的是家乡一带长年不断的鲜笋和雪菜。如今冬笋快要长成，边笋却还未老。

听管理局的两位很年轻的负责人介绍，莫干山的别墅建筑早从 19 世纪末就有英美教士来修造，民国初年直到 30 年代，华洋资本家、官僚政客、上海大亨都纷纷来造别墅避暑。古堡式、欧洲田园式、现代式，各不相同。但大都不追求外观豪华，而着重地形、朝向、风水、景观，特别是内部设备浴室餐室考究舒适。建国后五六十年代也造了些新的宾馆，不少国家领导人都来过度假。如今留存的别墅建筑总共约有二百幢。

热情的主人陪我们走上山坡不远的花圃和碑林。说碑林其实是在绿林掩映中的白粉墙碑院。未到前，路边先有一座碑亭，一整块宽大青石上直行刻着陈毅手书莫干山纪游词，其中一阙曰：“莫干好，遍地是修篁。夹道万竿成绿海，风来凤尾罗拜忙。小窗排队长。”共有七八阙全以“莫干好”开头。碑院中的名家手书刻石都嵌在院内墙上，有沙孟海、陈从周、钱君匋等，老友张仃写的篆书也刻在那里。

下午主人早有准备地铺下纸笔砚，拿郁达夫于 1917 年

到莫干山写的一首诗，硬要叫我书写刻碑，吓得我只好推给苗子来干这活儿。诗题是《游莫干山口占》：

田庄来做客，本意为逃名。

山静溪声急，风斜鸟步轻。

路从岩背转，人在树梢行。

坐卧幽篁里，怡然动远情。

我一算 1917 年是三叔在日本留学时第一次回乡探亲，当时祖母为他和孙荃订了婚，大约是从富阳出来经杭州到过莫干山，口占了这首诗。其时他只有廿一岁。苗子用一张大纸，写的是行书，最后落款：“1994 年 11 月郁风苗子同游莫干山，”还把我写在前面，这就叫人弄不清楚究竟是谁书写的了。

下山时又是黄昏，经过旭光台停了车，我在路边摘下一把芦花走上旭光台。两层阁楼式的重檐建筑，空凌地坐落在山峰顶上。走上平台四望，真是“一览众山小”，走下来正对着一树枫叶映着夕阳，分外红艳，留下了一张照片。

1994 年 11 月 北京

莫干山二十四小时

又到江南赶上春

四月清明后，偷闲十日，奔向江南。

梅花过了，桃花已落，樱花一片原似粉红色的云，可已经零落了，被新生的嫩叶托住。点点串串的梨花，镶在墨绿的松柏间，如成堆的碧玉。而一树饱满的红海棠却艳妆婷立，她说：春正走到我这里。

南京，是雪松和梧桐的城市。五十年前看到过新栽的小树，如今已成浓绿的林墙。去时，梧桐树上扭曲粗壮的枝桠如天空上的游龙，回来时已缀上满树新叶。春，总比人走得快。

江南一带，沿着铁路和公路，大约十多年前普遍移植了来自川贵的冰河期遗留的水杉，这种水杉不同于普通杉树，它在冬天会落尽树叶。到处可见一排排水杉，高低参差，已长成像样的林行。去时，它们在天空的背景上是透明的，如叠印的一座座笔直的尖塔，回来时已缀上一层新绿的纱。我会记住它们，这比人类历史更古老的冰河期的树种，我要将它溶入我的画。

在车中，风景迅速向后移动。我渴望再见的油菜花田

出现了：一小畦，一大片，夹在绿秧田中，那耀眼的黄。别来无恙，娇黄的油菜花！

我为什么要渴望再见它们呢？这一切都那么熟悉。我又想起娘在二十多年前对我们姐妹兄弟说的话：

“我哪儿也不去。什么好风景好地方我都去过了。我只要闭上眼去想，那些地方就都到我跟前了。”

如今我也到了娘当时的年龄，可我到过的地方还想再去；没到过的地方，只要条件允许，我也都想去。这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也许因为这几年住在国外的缘故吧。

从小到大，无数次春秋，我曾徜徉在江南苏杭宁一带，可就没去过扬州。这一次。虽没有“腰缠十万贯”，可也下了扬州。果然，瘦西湖是“瘦”，柳色亭台倒映在水中，两岸低矮一片黄紫野花，如伸手可采。这里没有西湖的烟波浩渺，却曲折幽深另有一番风味。

没去过的地方自然有新鲜感。可有时越熟悉的地方越是想去。否则陆游就不会再到沈园了。

江南的春天，我太熟悉了。杏花春雨，远山绿柳黄菜花。可白墙黑瓦矮屋很少见，变成蓝玻璃窗、大阳台、红屋顶、三层楼。

无锡、苏州，一路的高楼大厦，新开发区，五颜六色的广告牌……小桥流水不见了。

人们在变与不变的时空中，感受着兴衰的沧桑。

变，是必然的，建设的兴起是好事。然而如果规划不理睬几千年历史形成的文化特点，有些不久便会被淘汰。

江南的春天，具有永久的魅力；但那魅力不仅来自自然，也来自它的人文特点。

1996年5月 北京

开向世界的窗口——香港

从香港回到北京一个月，参加了几次美协召开的座谈会，读了一些近期出版的书籍杂志，发现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其一是中国画的商品市场膨胀。影响到美术创作的倾向和对外的艺术声誉；其二是人才外流，有人想去香港或国外谋生，也有人担心外国的现代艺术思潮搅乱和腐蚀了我们的青年一代。

这不能不使我想起在香港三个月的所见所闻。由于是探亲，不是带着任务赶时间，所以比较从容。拉杂谈出来也许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实事求是地多方面思考和判断的依据，并非对问题作出回答。虽然有许多问题正是由于长期的闭塞封锁而引起的。

香港是离我们最近的开向世界的窗口，市场无税，欧美各大洲的商品，各国的生活方式，各种流行的艺术流派和最新时装都在这里展览和表演。虽然离得这么近，来往的人也日益频繁，可是传闻的情况就常与实际有距离，就因为两种不同的社会，基础不同，观念就不同，对于同一件事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反响。譬如关于机场壁画中有裸体

的部分被盖上了，消息在香港传开，首先是引起惊讶，不管什么原因，反正是盖上了就说明不容许裸体画的存在。于是有人嘲笑，有人惋惜，也有人认为机场壁画不管有什么缺点，总是很不容易打开局面的创举，已经宣传出去，这一来就很被动，不啻打自己的耳光。但是回到北京就了解到在香港所想不到的情况和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尊重少数民族意见考虑民族团结）。再看看《美术》月刊发表的有关裸体画的争论，和现实中确实存在的麻烦现象，如展览会中挂一幅人体就引起围观甚至起哄，而意见簿上则有相反意见的争论等等，都说明目前确存在一些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可是在香港，我见的有两个情况：一是满街路边的书报摊上摆的印刷精良的娱乐性杂志中，有不少用裸体照片做封面，走过的和站下来买报的人连看都不看一眼。放映色情影片的电影院前尽管有大幅色情广告，而上座率很惨，有时只一二成。二是画展中（从3月到5月在香港举行的油画版画展览我差不多都看过）虽有各种意想不到的画面，如一米以上的白画布用排刷蘸墨刷两下，或整个刷成一块全黑画布。连一条线一个点都没有，就是不曾见过一幅人体。

在街头或在连带出售镜框的小型画廊中，出售的油画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题材：帆船，帆船，大大小小的帆船，破旧的矮茅屋，几十年前贫苦的中国老人和小孩，黄包车



(至今在香港闹市中心的天星码头外，随时都有几辆中国同胞拉着黄包车专供旅游者乘坐拍照)等等，画得像蹩脚的涂色照片，如果拿到我们这里来，从内容到形式，无论雅俗都不会喜欢，然而在香港也能卖钱，虽然卖得很便宜。

中国画的出口绝大多数通过香港。国内就有多种渠道争相抢购当作商品出口，似乎外面需要量很大，也许这是两三年来特殊的政治情况造成的一时现象。在香港出售文物的较高级的画廊都出售中国画。而目前中国画的经营市场既不大也并不兴旺。作为商品的价值规律自然是：需求的多，货色少，质量高，价格就高；相反，抛出的多，质量降低，自然就要滞销。有一家中立报纸的艺术评论中就提到，由于着眼于销路，竟然纷纷模仿名家笔法，说内地有“太多的李不染和程九发……”。在香港经营内地中国画的门市部主要有集古斋、博雅画廊和中华书局，一般标价自三五百元至七八千元，折合人民币并不比北京高。但是为什么有些传闻和报道说某某的画在展览会上卖五万、十万呢？这就有复杂的多种原因。首先展览会与门市不同，有些是标了价并未真正成交，有些消息来源出自主持者的有意夸大宣传，也有些展览会上贴出红条写上“某某先生欣赏”以示定购；而闭幕后并不来取画付款，或只肯付一半或几折几扣，这在香港都是屡见不鲜的。高价真正成交的也有，往往是属于社会的人事关系或某些偶然因素，几

乎完全离开了作品本身。譬如有人为了显示自己的豪富。或出于其他目的，就说：“这个展览会上定价最高的画我要了！”他根本不需要看那是怎样的一张画。也有更多的人是为了推销的人的面子，或对此人有某种利害关系的需要。比较“好”的买主是那些财产可以站住脚了却需要一点风雅来装点生活的人，而这些人能够记住几个名家的名字已经不易，还谈不到真正的爱好。当然，真正的爱好者不少，收藏者也有，只是能出高价者不多。

在资本主义世界，由于所得税的累进率，收入和存款多了税率也更高，因此有钱人宁愿把钱用掉；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纸币贬值，把现款存入银行不如存一件艺术品。这都使得文物和美术作品的价格有越来越高的趋势。但能够进入这种市场的也只限于少数有定评的名家。最近在香港，第一次出现了某世界性商业公司主办的艺术品大拍卖（这种方式在欧美早已普遍），主要是近代和现代中国画与中国古瓷，都是私人收藏。一幅傅抱石的《湘夫人》，原估价七万元，经过现场争购抬价达到十八万元成交。据出售者说此画的拍卖是为了捐款给某学校。傅抱石的另一幅《西陵峡》则只有二万七千元。其他如黄宾虹、齐白石、徐悲鸿、潘天寿等名家（可能有真有假）的画都在一万至三万元之间。

艺术作品同时也是商品。在当今世界早已是既成事实。

我国为了四化建设基金，也无可避免地可以在统一领导下参与这种交易。但是在展览会中，特别是某些政府机构组织出口的“展销”，应该首先着眼于“展”字，而不应首先是“销”字。在香港听到不少维护我们声誉的艺术界朋友的意见：能不能来一些高水平的不一定要卖钱的展览会呢？能不能和艺术界搞一点真正的“交流”，而不只是和贸易界搞“交易”呢？

阔别三十年的香港，变化是很大的。老朋友们见面想带我去怀旧一番，但是已很少旧时的痕迹，坚道13号A，四十年前的漫画俱乐部，也是我们的画室，房子拆掉了变成高层公寓；中华中学，抗日文艺团体的活动基地，早已迁移了；三十年前的人间画会同人们比较集中的九龙启德机场附近的狮子石道，本来是偏僻的廉价区，现在成了九龙塘中心闹市。朋友们说，演变为现在这样高楼大厦林立和繁华的消费者天堂，也不过是十五年来事，然而却仍然是文化的沙漠呀！这也许是耕耘者的谦虚吧，许多四十年的老朋友始终在教育、出版、新闻等岗位上，运用美术之犁辛勤地耕耘着。香港美专的陈海鹰老校长几十年来如一日，每年送走一批学生，如最近在香港澳门举行的七人画展中的欧阳乃沾和陈球安就是他的学生。岭海艺专的卢巨川校长至今仍在星期日带领学生去新界写生。岭南派老画家赵少昂先生也在家里招收学生授课。从意大利归来的油

画家陈学书教授曾于1966年受聘于北京中央美院，正值“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天课也没上，只好到了香港。他说当时亲眼看见许多著名画家同事受到凌辱，他实在受不了，否则他是不会离开北京的。如今和他的夫人——意大利优秀的肖像画家，在半山上的住宅有一间画室，招收了十几个学生。老漫画家林檎，坚强地忍受着残疾的不便，每日勤奋不息地创作着，如今画一手漂亮的速写和彩墨画。为了生活他还要每天给报纸的娱乐版写电视专栏。中国画画家任真汉也有七十岁了，严重的耳聋也没有使他放弃任何机会到祖国的名山胜地搜集素材，每隔两年搞一次展览，也曾到新加坡展出。活跃不减当年的漫画家郑家镇，如今不但画中国画，而且写得一手好书法，行、楷、篆、隶都来得，还要每天到报馆编副刊，写评论，经常一天要写五六千字。《美术家》双月刊的主编黄茅更是连星期日都不休息地躲在编辑部里工作，这间不到十五平米的办公室总共只有连他在内三个半人（一人半天学习）。而他这些年来写评论的成果异常丰富，一本一本小书不断出版。……这些老朋友见面谈起来有句口头语：“搵食啲，大佬！”（广东话“为了找吃的呀，老兄！”）其实这也是谦虚，他们的紧张劳动岂止是为了找吃的，而确实为了找吃的也必须付出很大一部分精力。此外，许多从事美术设计或编辑工作的年轻人除了八小时工作以外，还利用晚上读专业的夜校进



修。如果谈香港的所见所闻，不提这些朋友和其他许多人的严肃紧张的工作的一面，那是不公正的。

说文化的沙漠也有一定的道理，虽然在文学、美术、历史、哲学、音乐、舞蹈、自然科学……各个门类都不乏有深入研究的专家，但是他们的作品和活动只限于一个小圈子，远远不能征服热衷于电视“欢乐今宵”、竞选香港小姐或连映武打长片的观众，和“马经”（马季每星期六赛马，不少报纸有“马经”副刊）、“娱乐版”（主要是电影电视明星的私生活）、美容杂志的读者。而一本真正的好书销数一般是一千到两千。

在香港从事文化工作的朋友们除了羡慕我们不愁衣食之外，他们是多么羡慕我们的书报杂志能够拥有十万、二十万、五十万、甚至一百万的读者啊！

在我们这儿，不少人羡慕香港，羡慕录音机、电视机、太阳镜、手表、照相机……在我看来，值得羡慕的确实是有，但不是这些。

譬如，高楼房子造得快，而且凡是大型新建筑，必定在建筑费总额中有百分之五到十五给艺术家设计创作雕刻、壁画或其他室外室内装饰。就我看到的，已经住满居民的美孚新村的几个中心庭园都布置了几座圆雕，多数用金属材料。正在兴建、已经一半住人、尚未完工的太古城，也聘请了美术家文楼创作多种室外雕刻，用什么内容形式和

材料，完全由作者决定（已大半完工，见《美术家》双月刊第十二期）。我还看到《八十七神仙卷》线描稿被放大到几十米宽的横幅。用线刻的形式装饰在一座银行大厦外观的墙面上。也有个别高楼外观的立面，装饰一条以中国历史或神话故事为题材的彩色壁画。至于小型的商店、餐厅、咖啡室，虽是小小的铺面，也常是从门面外观到里面布置有完整的总体设计，包括使用的器皿都统一在某一种地方情调和独特风格里。如北欧荷兰、南欧意大利、东南亚印尼和马来亚、日本和朝鲜等等都各有鲜明特点。更多的是用中国民族民间艺术图案作装饰，如在沙田一家餐馆，用殷商铜器纹样，用金属材料包制整座拱形大门。另一家在中环的大旅店厅堂内，用潮州金漆木雕密集联结成一组壁饰带，等等。

我并不是羡慕所有这些设计（水平高下不一，有些很好，也有些设计繁琐庸俗），而是羡慕这种做法正是我们的许多同志如梁思成、张仃、郑可、庞薰琹、张光宇等等在二十多年前就经常谈到的设想，如何用我们民族民间的最美的艺术来装饰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厦，如今在香港却这样做到了，为什么我们头发都白了，有的已经告别人间，却还做不到呢？想到这里就不仅是羡慕，而简直是妒忌了！

在香港也听到有经验的中国建筑设计师的呼吁：国内许多建设规划正在开始，与其花高价聘请美、日外国专家



设计，为什么不就近请香港的中国设计师呢？这个意见值得领导重视。其实，就在国内不也有不少建筑和装饰设计人才没有用上吗？

除了上述较大工程的需要以外，几乎每条街都有出售家具窗帘地毯的室内装饰设计公司 and 广告美术设计公司，大量的从业人员都是本地培养的，香港政府办的理工学院每年毕业的设计人才（包括建筑和工业造型设计）约三百五十名，私立的大一艺术设计学院分日夜班教授各种设计课程，这是几位中青年美术家创办的，其中林信就是 60 年代中央工艺美院的毕业生，院长吕立动去年曾到中央工艺美院讲学。此外还有些类似的学校，学生毕业后大都以艺术设计为专门职业。而不是去画油画或中国画。在我们这里却相反，美术学校的学生看不起设计工作，不安心于设计工作，连有些工艺美术研究所都不是主要研究设计，而是热中于画中国画。

装饰艺术设计和所谓纯艺术创作虽然是两种范畴，但自古以来就是联系在一起的。有那么一段历史，似乎装饰艺术是工匠的事，纯艺术家看不起工匠。如今从“四化”的需要来说，工艺美术设计是最直接能为“四化”服务的。从现代世界艺术潮流来说，不管你看得起看不起，所谓纯艺术不能不为装饰艺术服务，而装饰艺术的需要极大地影响着新的艺术流派发展的道路。从 20 世纪初出现的立